

# 大师的旷世之交



吴宓 (1894~1978)



陈寅恪 (1890~1969)

## ■滕客

吴宓与陈寅恪，是20世纪的两位国学大师，他们的命运长期交织，荣辱沉浮，至死不渝。他们的友谊令人感动，命运令人心酸，人格令人敬佩。

吴宓与陈寅恪是坚守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。他们的交往始于1919年的哈佛大

学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。当时，吴宓惊其博学，服其卓识，并给国内朋友写信说：“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，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。”并多次说：“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，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。”1925年，吴宓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，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聘请陈寅恪为“导

师”。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，朝夕往还，吟诗唱和。旷世之谊，令人赞叹。

吴宓与陈寅恪的交流，不仅在学识上，还涉及处世与婚恋。吴宓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，如：“陈君寅恪云‘学德不如人，此实吾之大耻；娶妻不如人，又何耻之有’。又云‘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，小之又小者耳。轻描淡写，得便了之可也。不志于学志之大，而兢兢惟求得美妻，是谓愚谬’。”陈寅恪的这一席话，对吴宓决心与陈心一成婚，起到了关键的影响。尽管这段婚姻并不长久，吴宓后来还是未能全盘接受陈寅恪的婚姻观而移情别恋，但两人一见如故的不寻常的交谊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吴宓与陈寅恪还曾卷入了一场改换校长的风波。1927年7月18日，陈寅恪、吴宓等教授联合发表宣言，反对清华校长长违背校章，妨碍全校发展的决定。同年11月10日，在教授大会上，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。陈寅恪和吴宓一向很少涉足行政俗务，然而在1927年的这两次风潮中他二人却颇为积极，且配合十分默契。但仔细思考，吴陈二人的本意，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。

吴宓与陈寅恪都有着独特的个性。就性格而言，吴宓急躁多虑而热心公益，陈寅恪则沉稳坚毅而志在自修。在抱负上，吴宓毕生怀有“斯文同骨肉”的大悲悯之

心，所言所行更偏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“立德”，以大块为文章；而陈寅恪则多洁身自好的恬淡退隐思想，侧重于著书以“立言”。然而在为维护中国传统文所谋之“道”方面，两位大师却又是殊途同归的。

不过，他们的命运却是悲剧式的，他们的晚年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。吴宓晚年受迫害，精神大坏，据说他常大喊“我是吴宓教授，我要喝水”等语。回忆背诵老友陈寅恪的诗文，成了吴宓晚年的心灵慰藉之一。1973年6月3日的吴宓日记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近晓4时40分再醒。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‘隆春乍见三枝雁’，莫解其意。”而陈寅恪在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就成了冲击对象。学术助手被赶走，原来照顾他的护士也被赶走。他不但目盲，而且早在1962年跌断了右腿腿骨，不能行走，后在折磨中去世。后人读到吴宓最后写到广州打探陈寅恪生死消息的那封信，泪欲先下。那一代学者的命运，总令人唏嘘不已。

现在感慨的是，大师已经远去。那时的他们，有知识，也更有情趣；有性格，也更讲人格和品格。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儒雅、学养、对自我的克制，以及对社会的奉献，应该千秋万代去绵延的。其实，大师与知交的交往中，有太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。就交际而言，人这一辈子，有这样的旷世之交，此生还有何求？

## 民国时电影明星收入多少？

## ■陶坤

当下，电影演员是一个高收入职业，尤其是明星。民国时期，电影明星同样收入不低，但相比今时今日，一些演员的片酬动辄达到几十万甚至数百万，还是有些差距的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，胡蝶则是当时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。胡蝶出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《歌女红牡丹》，更是令她红遍全国，被誉为民国电影皇后。那么，这位当时的最大牌影星收入如何呢？1928年，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，拿到高达2000元的月薪（实际支取1000元，公司欠1000

元）。月薪2000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？对比当时，一个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为20元左右，胡蝶的月薪足足达到工人工资的100倍之多，绝对称得上超级高薪了。

这还不算，作为电影明星，除了赚取月薪外，还有不菲的片酬收入。胡蝶一部电影的最高片酬达到2000元，也曾红极一时的阮玲玉的最高片酬是1000元，曾出演过《青春线》、《桃李劫》等经典影片的影星陈波儿，片酬约为300元每部。周璇成名后曾到香港发展，她在香港拍片的最后两年，每部电影都是以几十根金条来计算片酬的。

相比这些大牌明星们的丰厚收入，一

些刚刚出道或名气不足的小演员，收入水平则要低得多。1935年，出道不久的周璇签约电影公司，月薪仅有50元，直到1937年她出演了电影《马路天使》后一炮而红，月薪才涨到200元。当时，其他演员的收入比大明星们普遍要低上一个档次，蓝苹（即江青）、秦怡等人的月薪都在60元左右。一些男演员稍好，例如因主演《十字街头》、《马路天使》而走红的赵丹，月薪一度达到200元，而演员出身的大导演谢添当年月薪最高时为250元。

可以看到，民国时期电影明星们的总体收入水平不俗，虽然称不上日进斗金，但相比劳苦大众的艰辛，电影明星们已经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优渥生活了。

## 为何购物 叫买“东西” 不叫买“南北”

## ■万祥

“东西南北”本来都是表示方位的词语，为何后来“东西”又被当作物品的意思呢？

有一则小故事说“东西”代指物品，与宋朝理学家朱熹有关。

有一天朱熹在路上碰到精通五行学说的好友盛温和提着篮子，于是问道：“你去干什么啊？”

盛温和答：“去街门买东西。”

朱熹愣在当场，原来当时还没有“东西”一词。他不解地问：“买‘东西’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何不买‘南北’？”

盛温和笑着说：“真不明白？你这位大学问家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。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明白了。”

朱熹低头思考了一会，豁然开朗。

原来在五行之中，“东”即“木”，“西”为“金”，“南”属“火”，“北”乃“水”。盛温和说买“东西”，是指买金木一类的东西；“南北”指水火，是不能装在篮子里的。从那以后，“东西”一词就代指物品，流传至今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个传说。“东西”一词的确是在古代就有了。东汉时朝，洛阳和长安是两座繁华的商业城市，洛阳被称为“东京”，长安被称为“西京”。民间有人到东京、西京购货，就称“买东”、“买西”。久而久之，“东西”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，于是买“东西”一词就流传开来。

## 谷雨曾为植树节

## ■华悦

在古代，并无明文规定的植树节。不过，植树造林毕竟是一要事。特别是桑榆，对农业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每年，多数农家种植桑榆，多选在清明前后。这个时间气候和湿度，都比较适合树木的生长，存活率也较高。

民国建立后，植树造林的重要性，越来越为人们所意识到。所以，民国政府下令，以清明节为植树节。在这一天，各地都会举行植树活动。而民间自发的植树造林，也多选在清明前后。但这么一来，问题就出现了。

在北方，特别是靠近边塞的地区，比如东北和西北等，清明节前后并不适合植树。在这些地区，哪怕到了清明，气候也还

没回暖。寒风凛冽，土地还没解冻，很多地方甚至积雪未化。就算勉强种下去，存活率也很低。

所以，对于这些地方来说，每年清明节的植树，多是做做样子，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。后来，包括东北在内的一些省市就提出，植树节应根据各地的情况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而不应拘泥于清明节这天。于是，有些地方就将植树节定在了谷雨这一天。

谷雨已经是4月底，哪怕是北方的边塞，天气也已经回暖，土地解冻。这时种下的树，存活率高，不像以往那么劳民伤财。又一场空。正因如此，很多北方省市都陆续将谷雨这天定为植树节。而某些寒冷的北方边塞地区，更把植树节的日子再往后推，定在了5月1日。这么一来，植树才有

实际意义。

当然，这个举措也一度受阻。东北易帜后，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。接着，民国政府下令，由于植树节定在清明，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，意义重大，因此应该全国划一，取消区别，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。

这个不切实际的命令，导致有些将植树节定在谷雨这一天的地方，不得不将其改回到清明。而在东北，因为张学良的支持，尽管东北南部也将植树节改为清明，但北部则依旧维持原状，以谷雨为清明节。

时至今日，北方多数地区的气候，比民国时暖和了许多，自然不必将植树节定在谷雨。所以，谷雨这个曾经的“植树节”，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